觀察

THE OBSERVER

INDEPENDENT NON PARTY ·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第十五期

專論

和眞比戰難麼？　董時進

貧窮與貧窮問題　全慰天

漢代末年的學生運動　劉大杰

討論

「生產因素四分法」與革命　譚崇台

關於傳統經濟學的總答辯　樊弘

觀察通信

應變與求援（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華北山雨欲來（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冀東風雲（天津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帶　邵燕祥

和眞比戰難麼？

董時進

報載胡適之先生在北平講演，認爲中國的局勢「和比戰難，要難上千倍萬倍，而和中共談和平，根本是妄想。」這些話使一般渴望和平的老百姓見了，感覺十分掃興與失望。打仗要動員無量數人力物力，犧牲生命財產，應該是最繁重，最困難的，所以說兵凶戰危，任何國家非到萬不得已，決不肯輕易打仗。至於和，乃是戰之反，是消極的，只要不打便是和。不打，應該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何以反而是最困難的？假使說和平的實現，眞有困難，也不過是因爲雙方的首領互不肯讓步，但是，只要有一方面肯作比較重大的讓步，和平也沒有不能實現的道理。

胡先生認爲與中共談和平根本是妄想，這不啻首先關上和談之門，而與一般人認爲中國的戰事任何一方面也不能殲滅對方，而最後必是一個和談結局的意見恰正相反。胡先生大致是認爲政府早晚必可以平服中共。但這究要等待何年何月，以及最後到底能否辦到，恐怕一般人民很少與胡先生有同樣的信心。就過去的事實而論，以往和談之所以卒不成功，並不能歸罪於中共一方面，這是一般人的公論。因此，我們實不能閉首就一口咬定，和平根本不可能。

胡先生一方面認爲和平萬不可能，一方面似乎也承認戰事亦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所以主張「只有苦撑待變」。他說：「所謂待變，不一定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只要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和平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能撑住，那麼，半年一年之後，大局不會沒有轉變。」不知道胡先生所期待的轉變，究是什麼樣的轉變，除了外援和第三次大戰而外，不知尚可能發生什麼奇蹟。胡先生說「不一定要爆發第三次大戰，」可見第三次大戰也是他所期待的轉變的一種，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期待。我們都祝禱它不要爆發。

假使再苦撑半年一年之後，大局依舊沒有轉變，或變得更壞，又將如何？胡先生有何把握，能担保將來的轉變一定有利於「我們」麼？

依據我過去所得到的印象，胡先生對於時局的觀察，與嗣後表現出來的事實大有出入。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前的那幾年當中，全國人士痛恨日本步步侵掠，多認爲非拚死抵抗不可，胡先生便是當時反戰最力的一個人。他認爲中國絕對不能同日本打，他說我們要度德量力，知己知彼，只有忍耐，等待五十年之後再說。想不到仗畢竟打了，而且勝利竟歸了中國。在民國二十二年春，我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一篇主戰的文章。胡先生即在他所主辦的「獨立評論」上把我痛斥了一翻。我並非要同胡先生算舊帳，不過他那篇反戰的文章恰與這次反和的講詞相反，所以不能不令人要想引用一下。他在那篇文章裏面曾說，他不能昧着他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的文章上有這樣幾句憤慨的話：「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胡先生說他的良心決不能容許他說這樣的話，他說他「讀了這種議論，眞很生氣」。接着他問道：『董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對於他的這一些問題，當時我曾經有答復，不在話下。不過現時再談胡先生的這幾句話，不能不有一些感慨。不知道胡先生是否認爲現在的作戰，也是「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不知道他是否仍願說，情願亡國，不願主戰的話。

他又說：「政論是爲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愼的態度。」

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了胡先生當時不曾把事情看準確，不過他的用心和上邊的幾句話是善良的。他不願昧着良心去主戰，主張處處存哀矜，這不能不說是仁者的用心。胡先生應該將那種哀矜之心拿在現時來應用。目前的戰事，不但已經進行了很久，而且規模是驚人的大，也是空前的慘酷。據政府派往徐州一帶觀察戰事的鄧文儀所發表的談話，也說抗日戰事也從來沒有這樣大的場面。被飛機轟炸起火的村莊，煙霧瀰天的照片，印在報紙上，使人見了心驚胆寒，不勝浩嘆。試閉目一思，那周圍至少數百方里的人民，以及全國各戰區無數的人民，流離失所，受飢受寒，房屋被燒了，父母兒女被打死了，或者鼓着眼睛看見他們的房子在燃燒，看見他們的父母兒女的血肉橫飛，我們應不難明白，爲什麼一般人民不能跟着胡先生「苦撑待變」。這般人民根本沒有生活，從何說得上什麼生活方式，及民主自由，更何能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胡先生既顧念幾千萬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現在正是拿出哀矜之心爲他們謀幸福與除痛苦的時候。

一般人民沒有願意戰的，將士願意打仗的恐怕也很少，士氣民心鼓動不起來，就是這個緣故。極少數人硬要驅使着，拖帶着這許多人去打仗，哪能不是一件難事？但是我敢說，只要一聲和平出來，全國人民都一定會歡欣鼓舞的迎接，不用政府發命令，到處都會懸旗放鞭炮。戰是難的，越打越難，和是容易的，比戰容易到千倍萬倍。至於和平以後的問題，以及生活方式等，自須求得解決，不過這一切相信是終究可以解決的，並且相信以和平的方法求解決，比較以槍炮求解決容易得多，而且比較「於我們有利。」在和平的社會上，大家動口不動手的環境中，任何人也不能強使全中國人民奉行他們所不信仰的生活方式。

貧窮與貧窮問題

全慰天

一

貧窮與貧窮問題在概念上應當是有分別的。人類生活必須進行在羣體中，如果羣體中每個人都吃不飽，穿不暖，在飢餓線上苟延生命，而沒有一人例外，那是貧窮。貧窮是羣體所共同的。貧窮問題則不然。在羣體中大多數人陷於貧困時，它允許有人享受特殊的生活，不受飢餓，也不受寒冷。古詩「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滿街衣羅者，不是養蠶人」，所描寫的不是貧窮，而是貧窮問題。貧窮原於生產力的不夠，只存在於人與物的關係上，而貧窮問題則發生於財富分配的不均，不僅存在於人與物的關係上，還連帶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上，可能更偏重於後者。

我們如果視羣體爲一個單位或整體，以全人口數量除全年收入或生產總額，所得的商數，即足以表示這一羣體絕對的貧窮程度。如果單着眼於這一羣體內的貧富距離，在財富分配的比較上，從上層階級全年收入的平均數中減去下層階級全年收入的平均數，所得的差數，便是其相對的貧窮，或貧窮問題嚴重性的指標。

二

絕對的貧窮，與一個羣體中的人口數量，其所佔有的土地面積，或嚴格說，可耕地面積，以及其已具備的文化程度或即生產技術，都有極密切的關係。英儒馬爾薩斯的學說，千言萬語一句話，就是「人口數量過多，必然招致貧窮與罪惡」。由於土地報酬遞減律的限制，可耕地面積的大小與貧窮有着反比例的關係。生產技術的改善，無疑可以減低貧窮的威脅；近年國內許多人士提倡工業化的主要用意在此。總之，土地面積與生產技術決定了這一羣體的財富總生產量，而人口數量則密切影響到財富的總消費量。總生產量與消費量的平衡，除了儲蓄或再生產，最後主要係於一般生活程度的高低。由於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此種生活程度就可以說是這一羣體的貧窮程度。

但貧窮問題雖與人口數量、土地面積與生產技術不無關係，而這關係至多是間接的，有時甚至是殊可不必的。此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一羣體共同財富的多少或有無，並不一定即是每個人所實際享受財富的數量。換言之，它們只能相互決定簡單的「人與物」關係上的一般比例，並不一定影響到複雜的「人與物與人」的關係上的實際分配。由此可見，貧窮問題的癥結是另有一工的。

貧窮問題的存在有它更深一層的道理。假如一切人類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有如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用不盡，人們不工作而自然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那不是適於貧窮問題存在的景況。不幸「樹上掛着葡萄，河裏流着生奶」的伊登樂園，迄今還不曾，也許永遠不可能，在地球上實現。在此種沒有「無虞匱乏」的情況下，由於人都有好逸惡勞的本性，希望工作得少而享受得多，又由於人與人之間沒有神經的連繫，各自苦樂可以不盡相同，所以社會中各個人的生物基本需要，必然只有從不平均的財富分配上求得一己的滿足。而與財富分配息息相關的是工資、地租利息及利潤等因素。固然個人的才能、職業與機遇的不同，也影響到財富不同的分配，但在分配過程中無論如何須通過這四道總門。尤其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如此。通過它們而出現的財富不平均的分配現象，再加上遺產原則的推波助瀾，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演成了嚴重的貧窮問題。

三

上述只是貧窮與貧窮問題的一般理論的比較分析。如果再從社會演化的事蹟中來說明二者的分別，也許更能對於上述意見有一個明確的概念。

原始社會中，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與生產技術的不發達，無論如何免不了飢寒交迫的苦痛。現在東倫敦貧民窟裏的貧窮程度，也較一般初民不知低下到幾千萬倍。初民固然不時也可獲取一個野豬或海象，大嚼一頓，但挨餓受凍的經驗總是相當普遍的。尤其在寒冬如此。愛斯基摩人爲節省糧食，甚至常於搬家時令衰老父母留在原處，飢餓以死。這無疑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局面。但在貧窮的背後卻找不到貧窮問題的蹤影。初民原本不能生產多餘的糧食，有了也不知道妥善保存，以備不時之需。所以無論何人獵取一個大野獸，都得與大家在短期內把它吃完。財富公有，苦樂同當，或許是這時對每個人都比較有利的辦法。孔子所謂「人得之，人失之」的理論，多少反應了原始社會的需要。此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不可能有貧富距離，至少貧富距離不可能太大。貧窮問題在原始社會生不了根，雖然它是貧窮的。

等到由漁獵遊牧進化到農業階段之後，尤其是由農業的鋤耕文化（hoe culture）進化到犂耕文化（plow culture）之後，由於獸力被使用到農業生產過程中，大大的提高了生產力，這時每一個人所能生產的糧食，除了滿足自己生物基本需要，剛好有些剩餘，可以被保存起來。這是職業分化、奴隸制度、私有財產、社會階級等現象出現於人類社會的關鍵。因爲即使在鋤耕文化階段，仍是「一夫不耕，或失之飢，一女不織，或失之寒」的局面。大家都必須附着在泥土上，工商等職業無法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財富無從累積，任何人都不能剝削，也就不被剝削。戰爭俘擄必然只有殺死，蓄爲奴隸，實在榨不出剩餘勞力來。因之社會階級的存在也落了空。基於此理，所以司馬遷所謂「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孟子所謂「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一類事實，必須要在犂耕文化的基礎上才能發芽與生長。與這類事實連繫在一起的就是羣體內部相對的貧富距離，有人衣帛食肉，有人終年勞苦而不得一飽。總之，犂耕文化雖然一面減低了以往貧窮的程度，但另一面卻是貧窮問題的起點。

如上述，犂耕文化階段雖已有貧窮問題的存在，但由於生產力不如今日發達，財富累積與貧富距離都受相當限制，所以貧窮問題也還不如今日嚴重。並且此時農業生產過程主要進行在自然力量嚴格控制之下，人們要「靠天吃飯」，所以無形中迷信天命，認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或者原於前生行爲的善惡。由於農業人口安土重遷，文化交流不容易大量進行，社會很少變遷，故此種迷信心理經久而不易動搖。因之，這裏雖已有貧窮問題，但一般人並不一定就意識到它；至少不容易意識到這是社會本身的問題，是由於人謀不臧所引起的問題。富人因迷信因緣果報的自私心理而推行的慈善救濟事業，結果也可使貧窮問題緩和下來。農業社會中的貧窮問題，大都如此被輕輕的按下不理了。

工業文化中利用無生能力所發動的機器，改變了以往「靠天吃飯」的局面，使人們從迷信天命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領悟到人的偉大，人力可以勝天工。這種心理與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機器生產情形下的貧富懸殊現象湊合在一起，於是使極嚴重的貧窮問題明朗化了。貧窮問題從此不再是天命的問題，也不全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屬於社會本身的問題了。可是這時却並不比農業社會，尤其原始社會，貧窮。相反的，貧窮問題最嚴重的跡象，都見之於資本主義的後期，即在社會演化史上較以往最不貧窮的階段。一面是有產階級的社會立法、社會保險等政策的絡繹出現，一面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運動、社會革命等事實的層出不窮。目的都無非在使有產者的貧富，通過政治的方式，多少轉入無產者的手中，期望減少或消弭當前嚴重的貧窮問題。

四

在貧窮與貧窮問題的比較和分別上，美國、蘇聯和中國各自的情形，正好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型態。

先就美蘇情形比較說。美國久矣被譽為「黃金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不但沒有受到絲毫損失，而且反獲得了許多「漁人之利」，更加呈現一種特殊的繁榮景象。而蘇聯原本是一個生產比較落後的國家，幾次五年計劃的一點成績，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毀，迄今還未嘗復原。因此，美蘇兩國貧窮程度的懸殊，由此可以想見。

可是在另一方面，最不貧窮的美國却是貧窮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從資本家到勞工階級的貧富距離，大到不能想像。Guther Stein曾在 The Spectator 上發表一篇「迷惘的美國」，認為美國「繁榮的背後，不是欣欣向榮的愉快和滿足，而是恐懼和不安」。因勞資爭議而引起的大罷工，更是常見於報章。而蘇聯雖然一般比較貧窮，但由於一般人主要靠工資的勞務所得而生活，很少甚至沒有財產所得的存在，故其貧窮距離比起美國來，幾乎可以說是小到了等於零。至少在蘇聯沒有汽車大王、鋼鐵大王一類的百萬富翁。蘇聯社會更不「迷惘」。

至於現在中國的情形，無論就貧窮或貧窮問題任何一方面說，都是有病的。中國可耕地面積有限，人口數量過多，而生產力又不發達，故命運已注定了是一個貧窮的社會。近年內戰蔓延，一面減低了原有生產力，一面對於已生產的財富又無情的毀於砲火，自更加深了貧窮的程度。中國的貧窮比蘇聯更有過而無不及。並且，全國有限的財富，又大部掌握在少數豪門資本家的手中，而逼着大多數人民在死亡線上苟延生命。不合理，不人道，無有過於此者。中國的貧窮問題也許不比美國的不嚴重。所以很不幸的，中國人正面臨着雙重的災難，其建設工作也是加倍的艱鉅。

五

根據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論，貧窮問題無疑遠較貧窮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來得嚴重。在社會演化過程中的現階段尤其如此。貧窮令人「苦」，貧窮問題令人「悶」。就人類社會說，自然最好是既無貧窮，又無貧窮問題，既不「苦」，又不「悶」的局面。萬一不得已而求其次，應當是寧「苦」不「悶」。因為人只要不「悶」，「苦」亦不覺其「苦」了，至少「苦」不太關緊要了。

免除貧窮是自然科學的責任，解決貧窮問題是社會科學的責任。由於自然科學的進步，現社會比起原始社會來，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了貧窮，至少貧窮已不太嚴重。然而社會科學依然停留在中世紀的幼稚階段，以之來應付現代自然科學所引起的嚴重貧窮問題，却有如治絲愈紛。果眞解決貧窮問題較免除貧窮更為當今急務，則主要工作無疑在於發展社會科學，並消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間的不平衡。

漢代末年的學生運動

劉大杰

這幾年來的學生運動，政府感着頭疼極了。政府用盡了各種力量來弭平學潮，都只是一種治標的方法，未必能有多大實際的效果。任何一種思潮一種運動的起來，都有時代的背境，都有政治社會的原因。在這一個經濟破產、社會腐爛、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的時代，知識青年，發出不滿意於現狀的呼聲，對於政治有所責難，對於現實有改革的要求，這實在是表示時局動盪不安的信號。這一種情形，歷史上是常有的。近一點的五四不用說，東漢末年北宋末年晚明時代和戊戌政變，青年學生都起過激烈的運動。每一時代的統治階級對於讀書人都採取高壓的政策，以大量的慘痛的屠殺，來毀滅他們的力量，結果是兩敗俱傷。但是後代讀歷史的人，對於那些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的言行，無不加以讚歎與同情。為什麼到了歷史上便變成了正義與英烈，到了現實便成為醜惡與暴亂。是非曲直何如此之不分明，何如此之沒有標準。是統治者沒有進步，還是歷史沒有眞理？我們只要把頭腦冷靜地想一想，便知道要弭平學潮，只有切實改善不良的環境，改善物質上精神上不良的條件，才是積極的治本的辦法。我今天特別提出漢代末年學生運動的史事，是想在這一幕悲劇的舞台上，看一看當代政治社會的黑暗與腐爛，以及當日統治者最後的悲慘的結局，那一個朝代末年的世態與人情，也很可以給今日的人們作一個參考。

東漢末年的幾個皇帝，都是短命天子，繼位的人都是幼小的孩子，什麼事情也不懂，結果是太后聽政、外戚專權、宦官得勢。女人宦官和外戚的鬥爭與殘殺，演成了東漢末年亡國的歷史。自和帝連合宦官鄭衆，殺了專權的外戚竇憲兄弟，一直到獻帝時候袁紹帶兵進宮，那幾十年的政治，完全掌握在宦官們的手裏。中間雖也有外戚如梁冀竇武之流，想從宦官的手裏奪取政權，結果都是送了性命，一事無成。於是宦官的勢力日盛一日，在朝的封官賜爵，掌管朝政，在野的親屬兄弟，佈滿州縣，刮地皮、害百姓，奪婦女、殺善良。眞是弄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關於他們的情形，史書上有不少的記載，我們今日讀了眞是只有憤恨和歎息。試看後漢書的單超傳云：『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妻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這些宦官都是桓帝時候的寵臣，一旦得了勢掌握政權，便無惡不作，為所欲為了。

我們再看侯覽的傳記：『侯覽貪侈奢縱，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破人居室，發掘墳墓，奪虜良人，掠略婦子』。這樣的兇惡奢淫，完全是盜賊行為。到了靈帝，更是寡廉鮮恥，叫宦官張讓作父親，李忠作母親。一點正事不作，一天到晚駕着四驢車馳騁郊外，有時候西園弄狗，同婦人飲宴取樂。又叫宮女在後宮開着小

店，販賣雜貨，與小民爭利，借着雜貨店的方便，正式定出價格來，賣官鬻爵。二千石的官價二千萬，四百石的官價四百萬，公一千萬，卿五百萬。積了錢都寄存到宦官家裏去。這樣的皇帝同那樣的宦官結合起來，政治上自然會產生出種種的混亂與罪惡，民衆自然會陷入痛苦無告的深淵。熱血青年的抗議與農民的暴動，自然會一觸即發了。

從西漢實行土地私有制度以來，於是貴族收買土地，集中財產，小百姓的生計，是日益窮困。王莽雖曾一度將土地收歸國有，限制資產，但他那種經濟政策隨着他的皇位完全失敗。到了東漢末年，貴族富豪的勢力愈形膨脹。他們都有廣闊的田地，壯麗的城堡和莊園，幾千幾百的奴婢，眷養無數的勇士和刺客，增厚他們的勢力。上可以抗朝廷的命令，下可以魚肉小民，掠奪婦女。小百姓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忍受那種無可形容的痛苦。仲長統在『理亂篇』中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牛馬豕羊，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這正是當日社會中一幅貧富不均階級對立的圖畫。政治的黑暗是如彼，經濟的腐爛是如此。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叫小百姓在飢寒中過生活不許亂動，叫知識青年一壁不響俯首聽命，這自然是不可能的。雖說當日也有許多無恥的士大夫和那些唯利是圖的讀書人，羨慕那種有錢有勢的享樂生活，於是用欺詐用游說種種不顧名節廉恥的行爲，去諂媚宦官巴結富豪，達到勢利的目的。『苟進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亂，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耶？』仲長統這幾句話，把當日無恥的士大夫的臉譜，刻畫得那麼分明，眞是沉痛到了極點。但是善良的讀書人，前進的知識青年和窮苦的小百姓，眼看着這種黑暗腐敗的政治，身受着官僚豪富的經濟壓迫，不能全無舉動，思想激烈情感狂熱的青年們，自然會發出反抗的言論與行動來，東漢末年有名的大學生運動，就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了。

關於他們種種活動的詳細史料，雖說被正統派的歷史家毀滅了，但我們從零細的記載裏，還可看出他們的宗旨和活動，他們是以三萬多個大學生爲主體，因爲再也不能容忍那種黑暗混亂的狀態，於是集體地向那些狐羣狗黨的貪官汚吏，發出有力的攻擊，對正直的孤立無援的人，加以熱烈的擁護。這些正義的呼聲，果然造成堅強有力的輿論。就是那些作威作福的宦官外戚，窮奢極侈的富豪，也不能掩耳不聞，大家都感着恐懼和畏縮，開始用收買取巧的方法，來緩和他們的情感破壞他們的陣容。可是青年們並不妥協，攻擊更加厲害了。同時，對於當日那幾個有思想有品格有胆量的李膺陳蕃和王暢，熱烈的擁護出來，成爲青年們的領袖。這三個人雖然官爵大小不等，但誅宦官殺土豪爲民誅害的思想是相同的。大學生因爲擁護他們，喊出口號來了，（這是中國最早的口號）『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暴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這口號雖是簡單，意義却是深遠。那就是說不畏強暴的可爲人民模範的人我們就擁護，反則就要反對。這樣一來，對於這新生的力量，宦官污吏知道非溫和政策所能奏效，不能不一顯身手了。罪名是容易的。擒賊先擒王，先從他們的領袖下手。『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誹訕朝廷疑風亂俗』。這罪名便成了亂臣賊子。於是靈帝就下命令，逮捕黨人，一捕就是二百多，逃了的還要懸賞追捕。這種恐怖，並不能壓服青年們的行動，反而更激動他們的熱情和憤恨。李膺他們有的是被捕了，有的是廢錮了，學生運動的集團，並沒有分散，言論的力量，並沒有減低。他們再接再厲的前進，陣容更堅強，加入的人數更多，聲勢也更加浩大了。宦官們看見這形勢，愈來愈緊張，眞是急了，知道不來一次大的屠殺，不能鎮壓這種運動。那時靈帝只有十四歲，天眞活潑，不大懂事。對宦官曹節說；『你們天天吵着要殺黨人，黨人究竟礙了你們什麼事』？曹節說：『黨人圖謀不軌』，靈帝聽了不懂，問他什麼叫不軌呢？曹節眞是太陰毒了，他知對於小孩子，非用一句恐嚇的話不可。他說：『不軌就是黨人要謀死你，他們自已來作皇帝』。於是那天眞的孩子，也就動怒了。這一次的恐怖行動眞是大規模的。一次殺了八九百黨人還不算，凡是當時行爲正直有點思想有點學問的人，一概陷害，妻室兒女，俱流竄邊塞。這是中國歷史上學生運動的空前悲劇。范滂臨刑的時候，悲傷的對他的兒子說：『我要你去作惡事，惡事實在是作不得。要你去作善事，爸爸一生是作善事的，但結果是要殺頭』。這話是多麼的憤恨，又是多麼的沉痛，難怪路旁人聽見了，都爲之掩面流淚哩！

不用說，宦官們是得志了，學生運動是失敗了。當時知識階級中的一點優秀份子，完全死在宦官們的刀口下。文化思想界蒙受了重大的損失，言論的自由被剝奪了。知識界的殘餘者，逃出了虎口的，只好躲在深山裏著書，或是藏在土洞裏修道。他們後來在歷史家的筆下，得了高士的清名。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這種局面維持不到幾時，漢朝也就亡了。

司馬光編完了這段悲痛的歷史的時候，曾感慨的說：『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廷，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於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他一面悲歎讀書人死得可憐，一面好像還在責備讀書人不識時務。以口舌同惡勢力鬥爭，其危險自然是等於撩蛇頭踐虎尾，但讀書人也就正要在這種地方，才可表示勇氣與正義。司馬光這一種明哲保身、卑弱自守的觀念，實在是太消極了。難道東漢的亡，還要黨人負責嗎？這一次的學生運動，雖是失敗了，實在是中國知識份子偉大精神的表現，是爭自由爭正義反暴政反豪門的偉大精神的表現。這一次運動，是可歌可泣的！

歷史的事實，活躍的擺在我們的眼前。牠可以讓我們認識古人，也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牠是一面透明的鏡子。可惜今日居高位擁大權的人們，不肯照一照這面鏡子。會讀歷史的人多，會用歷史的人少，這眞是一種永恆的悲痛！

「生產因素四分法」與革命

譚崇台

一

樊弘先生在「傳統經濟學何以竟成了阻礙中國進步的絆脚石」（觀察五卷五期）一文中，指出傳統經濟學有兩個基本假設足以妨害革命觀念的發展。第一是把生產因素分成四種，勞動、土地、資本、和管理，第二是把主觀的經濟法則普遍地應用到本質不同的客觀社會。拜讀樊先生

大文後，頗覺他對第一點的批評意有未盡，因寫此文，並向樊先生請教。

二

從技術的觀點去看人類的生產行為，我覺得生產因素四分法的本身并不承担阻滯革命觀念發展的過失。單純憑勞動，生產行為殆成為不可想象的事。最原始形態的生產，也必需勞力與自然（土地）的結合，如要增大產量，則必賴中間貨財（intermediate goods）的出現，使生產過程拉長，從直接生產方式變為間接的迂迴的生產方式；換言之，必須在勞動與自然之外，給生產行為加上另一個因素——資本。生產行程加長、生產規模加大的結果，勞動、自然與資本如何配合方能有最大的效率，生最豐美的成果一問題，給生產行為帶來了一個新因素的需要，即是，要從事大規模的生產，除勞動、自然與資本之外，還需要一種特殊形態的勞動——管理。

照勞動價值學說，資本是過去的勞動所積成，因此資本也是勞動，不必獨成因素。但「死勞動」與活勞動畢竟有死活之分，我們如將「死勞動」定名為資本，而此物又確為生產行為所必需，則名之為要素也似無不可。至於生產行為圓滿之後，純生產究係祇來自勞動，抑或資本、土地與管理也各有貢獻，早已成為經濟學說上的爭論。但從事生產行為時，技術上有一個確切不移的事實：即以同質同量的勞動從事生產，土地愈肥沃、資本越豐富、管理更進步者所得的純生產量越大，因此即使否認資本土地等對純生產各有貢獻，也無法否認一個技術原則：要增大勞動的純生產力，必須以資本土地等因素量與質的增加為要件。

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中央設計機構不特要付給管理因素以「利潤」（採取薪津或俸給的型態），而且為了要把資源的分配達到最大利用的境界，還必須把資本的「利息」及土地的「地租」計算在社會成本(social cost)之內。社會主義實現之後，資本、土地等非人生產資源（nonhuman productive resources）雖已從資本家和地主手中獲得解放，但數量上有限的問題并未消失。如要使有限的資源獲得最經濟最大效率的使用而不流於浪費，中央設計機構不能不付與此等資源以適當的「價格」，在使用時必徵收適當的「費用」，即資本須付「利息」，土地須付「地租」。但此種「價格」不為一種市場價格，而為一種由中央設計機構所決定的帳面價格(book keeping or accounting price)。土地與資本的價格在賬面上一經決定，再加上生產技術的客觀條件，則勞動可與土地資本最有效率地結合起來，社會資源的分配不致有所荒廢或濫擲，而且消費貨財的價格因此得到正確的計算，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可以依照善擇原則得到最大的滿足。

試以土地為例，今假定在一想像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有甲乙兩勞動者具有同質的勞動，以相等的工作強度用同樣的種子，在沃度不同的兩塊耕地上耕耘，則生產的結果，耕沃土的某甲的收穫自比耕瘠土的某乙為多。此兩人的勞動既同質，工作強度又相若，則所得的工資應彼此相等。此時，如祇把工資當成唯一的成本，則兩地所產的穀物因產量互異而單位價格應彼此不同，沃土的穀物價格低，瘠土的穀物價格高，但在實際上，此兩種價格不同的穀物的品質又并無差異。如要使價格劃一，轉而付甲工以更高的工資，則又失去「等勞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human efforts）的意旨。唯一的妥善方法，是由中央設計機構，在計算穀物的成本時，除了工資之外，還須計算土地的價格，肥沃的土地價格高，貧瘠的土地價格低，則穀物的價格都向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看齊，而勞動者也獲得均等的報酬。但穀物的總價因加上土地「成本」的結果必還較勞動者所得的總收入為高，勞動者的購買力將不足換取穀物，中央設計機構再將此兩數的差額，亦即是土地的「地租」，用總額社會紅利（lump-sum social dividend）的方式分給勞動者。其結果，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土地的「地租」依然存在，但不屬諸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而屬諸出汗出力的勤勞大衆；不是不公平的財產所得，而是由大家平分的社會紅利；不是由私人競爭而形成的市場價格，而是由中央設計機構所決定的帳面符號。此種「地租」取之於勞動者，仍還之於勞動者，但此「轉帳」的方式并非會計上的魔術，反之，能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價格機構圓滿形成，同質同強度的勞動報酬相等，社會主義的理想得以順利實現。

三

從生產的角度去看，生產因素四分法并不具有對革命觀念的反動性，但在傳統經濟學的整套理論體系中，生產因素四分法却成了曖蔽現存經濟制度榨取本質的有效工具。

傳統經濟學把社會生產物的生產和分配看成同一程序的兩面，例如工資，一面是生產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勞工分配社會生產物所得的一部份。而尤為荒謬的地方是把「所有」（owning）也當成一種生產性的活動，因此從資本土地應由社會所得取得配額的推論跳到佔有資本土地的階級，也猶如工人一樣應從社會生產物拿出一部份的結論，更用「犧牲」（sacrifice）、節欲(abstinence)期待（waiting）等似是而非的學說來為地主和資本家辯護，說他們之所以能擁有土地和資本是他們個人茹苦含辛艱難奮鬥的結果，同時，意義含糊的利潤概念，又暗暗地掩飾了在現存經濟制度中，企業家以獨買（monopsony）的方式榨取勞動者，以獨占（monopoly）的方式剝削消費者的本質。

傳統經濟學有意地而又無意地把生產和分配纏混不清，纏混不清的結果，生產因素四分法也被利用為給現存經濟制度辯護的工具。但生產因素四分法的本身并無過失，資本、土地和管理的本身，也和勞動一樣，并無罪惡。一朝社會主義實現，生產和分配兩個問題，將由中央設計機構一刀兩斷；生產追求效率，分配本乎公允。資本也好，土地也好，都成為由中央設計機構自由支配自由運用以增加人民福利的客體，完全失去當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剝削和榨取的性質。

四

在今日而言經濟革命，我覺得至少有兩個重要觀念必需澄清。

第一，經濟革命的崇高理想是「均富」而不是「均貧」。在短期之內，「均」可以作為革命行動的口號，但在長遠的將來，「均貧」決不能滿足人民當初的希望。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榨取性的生產關係，不公道的分配方式，造成貧富懸殊福利不均的現象，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罪惡，消滅此種罪惡，正是革命行動的目標所在。但革命決不應消滅資本，毀滅資源，捨去技術，而只留下一羣赤貧徒手的勞動人民，使社會生產力低沉衰落，社會物質幸福的水準倒退幾百年。資本土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資本家與地主階級。資本土地為生產行為所不可缺少，它們的量與質的增加也正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要件。制度有罪，為制度所支配的客體的本身却并無過失。蘇聯的五年計劃目標何在？蘇聯人民在新經濟政策時代節衣縮食所為何來？還不是痛感社會生產力的薄弱，社會資本的不充足，而在那裏節省消費從事社會資本的積蓄以建設更迂迴性的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人的剝削關係要完全剷除，物的寶貴價值要小心珍惜，這個經濟革命原則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尤其值得重視。我們應還記得，「雙手萬能論」一時曾為極端頑固份子所倡導，以「均富」為革命目的的革命者不能不對此有所警惕。

第二，容許「資本化的生產方式」(capitalistic method of production) 并非容許剝削關係的存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化的生產方式」之所以代表一種榨取關係，是因爲法律保障財產，地主資本家憑他們對土地資本的所有權向社會生產物要求地租利息的分配；是因爲在「自由社會」名義之下，企業家得以特殊的地位，取得憑獨佔獨買而產生的盈利以及因特殊機會而出現的暴利。一旦經濟革命成功，資本土地轉屬全體人民，管理生產的人員由政府任用，「自由競爭」不復存在，生產暴利不再出現。在中央設計機構的「藍圖」裏面，勞動、土地、資本和管理，都被當作生產要件，對生產各自發揮最大的生產力，而生產的所得却只歸諸出汗出力的勤勞大衆。要生產力高，不能只憑「胼手胝足」，而必辨「資本化的生產方式」的建立；要分配額平均，須根絕所有權的觀念，而必賴對現存經濟制度革命的成功。生產力龐大，分配額公允，這才是人類最高經濟理想的實現。

關於傳統經濟學的總答辯

樊　弘

在觀察五卷五期上，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中國的絆脚石？」我預料着這篇短文發表後，必然會引起許多的補充和反駁。果然，在觀察五卷七期上便有翁詠霓先生一個駁論，題爲「生產要素四分法合理乎？」此外還接到幾位青年朋友們的來件，有的是給我補充的，有的是向我質疑的，有的是借着討論這個題目的機會，發表他個人，在新社會到來以後，所試擬的工資、地租、和利潤的政策的。我對這些先生們的意見，本應分別的答覆和請教。但一來呢，因爲自政府金圓券政策實現以來，越發的貧困、忙迫和煩惱，雖欲分別覆答而力有所不支。再來呢，因爲這些先生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也許還是一般的或多數的讀者所共同感觸到的問題。不過他們喜歡把他們說出來，而後者不喜歡或不能夠就是了。既然如此，憑此一個公開的答覆，也許倘可以向更多的讀者貢獻愚見，並且鈎出更多的寶貴的意見出來。這便是我決定公開發表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總答辯的原因。

在這些先生們的意見中，楊詩浩先生以爲，依據一般銀行家們的見解，放利的資本家，以其儲蓄化爲資本取得利息，似乎是合理的。詩浩先生是在銀行作事的。他的意見大約是指一般貨幣資本家們對於銀行利息的一般的看法。依據這種看法，利息可以誘致資本的供給或儲蓄。假如沒有利息，儲蓄勢必減少，消費勢必增加，結果生產的資本勢必減少，同時勞動的生產物，因爲缺乏資本的幫助，勢必也要減少，這豈不是很有害麼？反過來說，就是利息的存在，因爲可以誘至儲蓄或資本的供給，似乎是合理的

但我以爲即令利息爲零，但資本的供給，仍是可以源源而來的。試設一例以明之。假令在經濟衰敗的時候，社會上有強制失業的現象存在，或有相當廣大的勞動後備軍，又如此時現存的資本亦有剩餘的生產力。爲解救經濟的蕭條起見，銀行採取無利的放款政策，而以膨脹通貨的方法，向工商業者爲無利的貨幣資本的供給。工商業者於是以此貸款僱入失業的工人與原料，充分的利用現存資本的剩餘生產力，生產出嶄新的或淨餘的資本或生產的手段出來，資本的供給可能立即隨之增多。這豈不是說，資本的供給縱令利息爲零，亦可以爲龐大的增加麼？

無利，資本的供給亦然可以增加。有利，資本的供給也許會減少。這個道理極易了解。任何一個資本家在增加投資的時候，他首先考慮的，就是在他投資之後，於其所得之中，除了成本之外，所餘毛利是否夠付利息。現在假令利息爲零，則是所餘毛利悉爲純利，當然他便要增加投資了。結果生產的資本豈不是便有增加麼？設令利息增加，所餘毛利尚不足以付利息，投資勢將減少，結果資本的供給當然亦減少了。這豈不是很明白的事情麼？

無利既然資本亦可增加，有利資本反而還要減少，足見利息不是誘致資本供給的必要條件了。何況今日放利生息之人，皆爲不勞而獲之輩。以言享受，高澈雲霄，以言勞動，等於烏有。這還不是剝削是什麼呢？剝削既可減少生產又可破壞正義，莫怪社會主義者要說利息是不合理的了。但我的答覆很簡陋，恐怕不能令人太滿意。

現在我要回到翁詠霓先生在觀察五卷七期上所提出的問題了。翁先生以爲傳統經濟學上的四分法仍然是合理的。他的理由是，利息係以酬報儲蓄勞動之物和利潤係以酬報經營勞動之物，所以利息與利潤均是合理的。我以爲，在「管理」與「所有」尚未分離之前，利潤尚可解爲經營的報酬。在「管在」與「所有」分而爲二之後，利潤似乎只可解爲資本家們的剪票取息的報酬，而不能解爲經營的報酬了。因爲經營大半都係由經理担任，不由剪票取息的資本家來担任。後者既不負担經營的責任，當然所得的利潤，便不是他們的經營的報酬了。他所得的利潤，至多，可以說是資本家剪票取息的報酬而已。農人、工人、技術家、工程師與經理人，平均說起來，十點汗尚換不得一點錢，然而資本家，因此些微的剪票取息的動作，一舉便可獲得無比肥大的利潤，何其動作之値錢也如是？再說，世上的大中等的資本家們，連剪票取息的這點些微的工作也是不作的，而由他們的傭人替他們代辦呢。似此，則是不到場的資本家們所得的利潤完全是種不勞而獲的賊贓了。即此可見凡屬在表面上負有所謂經營責任的資本家，假如他的所得超過經理的薪俸太多，亦很難說，在他裏面，十分有七不是一種不勞而獲的賊贓了。不！說是賊贓也許太過火一點，實則利潤絕非一種不合法的賊贓，他可是一種合法的所有的權利。無非這種權利是建築在剝削的關係上就是了。從經濟的觀點上說，剝削而有利於生產的增加，很難說他不合理。可是現在世界已有一個無剝削關係存在的社會，那麼不但分配極爲公允，而且生產亦頗豐富，而且這一種社會比起世上其他的賦有剝削關係存在的社會來，倘且既無恐慌的襲擊，又無失業的恐怖。假如說前一種社會是合理的，那麼，後一種社會現在便必也要逐漸的由合理再化爲不合理的了。

資本與利潤根本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且又爲勞動者所有，只因法律不爲勞動者所有，即在法律的關係上，資本屬於非勞動的階級。因此，勞動者的階級便不得享受他們的勞動的全果了。設使勞動者階級一旦取得了政權，把法律的製造逐漸掌握在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澈底改變所有的關係，把主要生產的手段由私有化爲公有。試問社會上還有什麼太懶的人可以得到了不得的利潤的事情存在呢？

現在有許多的經濟學家都以爲資本是由儲蓄而來，實則不然。資本完全是由勞動創造而來。勞動創造資本，但不能所有資本。資本家雖不創資本，但能所有資本。千人創造，一人佔有。不幸這些「余一人」的獨佔家，反欲抹殺了千人創造資本的功勞，說資本非由千億萬人的血汗創造而來，乃係由「余一人」的佔有儲蓄而來，並以他的佔有與儲蓄的功勞很大，應當得到利潤，不幸這種荒謬的理論反而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們的認許，這可是可以尋昧極

了。但我以爲這一種謬論的產生，其部份的責任應由經濟學的四分法來擔負。

我大胆的建議在經濟學原理上根本取消這個充滿著騙人意味的四分法。實則已無須我們現在建議取消他，因他早已失掉了他的存在的根本條件，現在的經濟學家也逐漸在放棄它了。

翁詠霓先生說，「我完全同意樊先生所說的傳統經濟學第二點的不合理的情形。」但什麼是傳統經濟學第二點的不合理的所在呢？傳統經濟學說的第二點不合理的所在無疑的就是由於傳統經濟學者們不承認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經濟法則。但這並不妨害在各時代有一共同的經濟法則。可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的經濟法則乃是最要緊的。傳統經濟學忽略了特殊時代的特殊經濟法則，乃是今日的經濟學家們忽略了今日的經濟制度裏最要緊的地方。翁詠霓先生既然完全同意我這第二點的意見，那麼，他勢必也要同意我所建議的對於經濟學的四分法的放棄。因爲這個四分法完全是超時代的。從時代的觀念上說，隨着人類對於土地生產力的發現，人的勞動生產力大有增加。這即是說，人在土地上加工，所得的成果，除以養活直接耕種者而外，倘可養活一個有閒的階級。經過一串的歷史的鬥爭之後，果然土地私有的剝削制度便出來了。同時坐吃地租的地主也出來了。所以在中古的封建社會裏面，土地的剝削關係實爲重要。到了工業革命時代，機器忽然起而代替了工具，生產量又增多了。在淨生產量之中，除了直接生產者以之養活他們自已的家庭而外，尚可養活另一個奢侈豪華的階級。經過一列的歷史的變遷之後，果然資本又爲一部份人所獨佔了，同時資本家階級也誕生了。由此可見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中，資本一開始便即賦有剝削性質的意味。所以在二十世紀的年代在政治經濟學上資本的剝削的性質實應該佔首要的位置。莫怪馬克思在研究政治學時要專門研究資本的關係了。資本的法則或土地的法則既然都是帶有時間性的，可是經濟學上的四分法則是超時代的，無論在任何時代四分法均可存在，這當然是超時代的了。由是經濟學上的資本的剝削的性質便被忽略了。爲縫補這種超時代的淺薄不堪的經濟學起見，所以我建議將四分法完全捨棄。

譚崇台先生關於經濟學上四分法的討論，是我在拙文草擬將完之後再看見的。崇台先生的討論比較客觀。他與我並無根本不同的地方。我意，在資本主義時代，爲暴露資勞之閒的矛盾起見，仍然可以不要四分法。在社會主義時代，資本的性質業已變遷，用四分法似乎並無妨害。但四分法把這四個因素平列，不能強調社會勞動的特殊重要，恐怕亦不會被人採用。

此外還有幾位青年朋友們的補充的意見。既是補充的意見想我便不答覆了。

最後我想引用馬克思一段話來喚起我們自己的注意。馬克思在寫給庫格曼（Kugelmann）的信裏面說：「不說一年，那怕就是在幾個星期中，如果勞動停止了，無論什麼國民，都會要餓死的。」我在此要替馬克思補充一句，即如果勞動停止了，不但新生產物沒有了，或不但國民要餓死，而且即舊有的生產物，因爲缺乏人工來修補，不久亦是要完全倒塌的啊！剝削！剝削！天下的資產階級的命運莫不被掌握在你的魔掌內！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於北京大學

觀察叢書●恢復供應

各書一律照定價四倍發售

新出三種

兩條路

樊弘著（定價四元二角）

樊弘先生年來在各地報紙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在國內思想界掀起了廣泛的影響。樊先生以他那種獨有的見解，批判了中國舊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提出了他自己的新的論點。這本「兩條路」也可以說是一部向人民的大胆的宣言；凡是注意中國未來發展的人，均應讀此書。全書凡十五萬言。

皇權與紳權

吳晗 費孝通等著（定價四元）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討論集。費孝通教授在「鄉土重建」的後記裏曾提到過想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去整理中國的傳統歷史。爲此若干對此工作有興趣的學者經常舉行討論會，各人根據他自已的見解宣讀他的論文；他們的見解不求相同，祇希望在不同的角度裏把共同的對象認識得更多一點。這些論文中有關皇權和紳權的編成這本集子。讀者可以在他們所開關的路徑中看到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一角，而且可以學習怎樣去做這一類的研究工作。全書十五萬字。

英國采風錄

儲安平著（定價四元二角）

本書以筆記的體裁，敘述英國各種政治制度的起源，社會階級的解剖，英國種族的來源，英人的性格和風度，地理氣候的影響，以及一般社會生活的階層。各種風俗習尚，本書搜羅得很多；這是以深入淺出的筆法，介紹讀者瞭解英國的一本通俗讀物，讀來絕不感到枯燥。本書在重慶「客觀」上連載時，傳誦一時。全書十五萬字。

已出十種・一律重印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增訂四版） 張東蓀著（定價二元二角）
2 政學罪言（三版） 潘光旦著（定價五元四角）
3 唯物史觀精義（五版） 吳恩裕著（定價一元八角）
4 鄉土中國（五版） 費孝通著（定價二元四角）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三版） 吳世昌著（定價二元二角）
6 英人・法人・中國人（四版） 儲安平著（定價二元六角）
7 論雅俗共賞（四版） 朱自清著（定價二元六角）
8 中國在戟盤上（再版） 何永佶著（定價五元八角）
9 鄉土重建（三版） 費孝通著（定價三元八角）
10 紅毛長談（三版） 塔塔木林著（定價 一元）

應變與求援

觀察特約記者

當前的變局

（觀察南京通信）

中國內戰的局勢，在急遽的變動中發展着。國共兩方主要的謀略也都是「軍事第一」，戰局推動着政局；同時以政略配合着軍略，而政局的轉動也就影響了戰局的隨時易勢。就事論事：從魯中、東北、晉綏、冀熱省會，一連串的軍事變局到眼前冀東走廊和平津外圍，長城邊沿的鏖戰或吃緊，先後接連地也在變，以迄最近徐淮戰局的時張時弛，還是在扭緊準備拉鋸，這一切軍事的態勢，無疑的是正在演變之中。濟南之失是一大變，東北之失更是一大變。太原和歸綏已臨城垣的爭奪戰，是將變中的一大變，而承德保定的棄守更是一大變，冀東走廊和平津外圍再有一變，當然也是一大變。這一切的變，小變和大變，變來變去，就會變成由局部到全面，而後便是北中國的一全面性的遽變。這一變的嚴重性不僅是屬於單純的空間，同時更是屬於時間範疇性上的歷史性或劃時代的一變。這一變不僅是軍略地理性質上的一變，而且是政治經濟運用上的一劇變，這將使中國政治經濟史、社會文化史、以及遠東國際關係史上各方面的發展，爲之改觀，抑且可能成爲中國政治大變局的一個新的開端。這將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東半球的一件頂大的事，可能大大地影響到中國和遠東的許許多多方面。此間權威的政治軍事觀察家的理智的客觀的判斷，這一變局正是內在地急遽的發展，而且這變局已有一種決定性的趨勢在發展。因此，正在醞釀中的江北地區徐淮海區的一戰，就半個中國的變局看，這一戰將是決定全變局中的最後一變的一次惡戰。這不僅是軍略性上的一戰，也是政略性的一戰。有識之士的揣測，認爲翁詠霓內閣之仍蟬聯而又不能蟬聯，所謂「戰鬥內閣」的呼之不出若隱若現，所謂「行憲」政府國會衆院之立法院已不能實行代議制型的人民的政權，以及最近「老成凋謝」的陳畏壘也永久「安眠」，大概都和這變局的推演息息相關。

戰局的遽變引起了政局人心的動亂，是無須細論了。當軸對這變局，自信心雖堅，而憂心如擣，亦不待煩言。應如何以應付此變局和有多少把握以渡過此變局的難關和險關，怕是還在未定之天。悠悠歲月，光陰似箭，自力更生的迹象渺如黃鶴，無處可尋，而當軸的言動確乎仍在仰仗外力，翹盼外援。殊不知自力更生才是搶救變局的唯一可靠的根據，外力的「美援」只能做爲條件看。得道多助，自助人助，可爲明鑒。歷史上，很少有自助乏力，更生無望而能專靠外力外援扭轉大局轉危爲安的。大局蛻變到現在，軍事演變到目前，已臨到京滬邊沿淮海沿岸等待半個中國見分曉的最後決戰，正是所謂瞬息萬變，一天應做半載或一年看，情勢逼人，既不容許你「以不變應萬變」，更不容許專靠那可望而不可卽的外援。不過，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陷於內戰苦局中的中國政府，已緊握着一面倒的「親美」路線，美政府在過去的三年中，也曾「援助」過不少的軍火和金元。於今事急矣，很難擺脫這依賴「美援」爲唯一救星的傳統觀念和打算。退一步說，果眞這「美援」仍是可靠而可源源接濟不斷，自亦不失爲一種妙算。然而衆所周知，經過特使外交大員接二連三的奔走呼號，仍不見「盟邦」的心回意轉。可是當軸仍是耐心不懈地在向這「盟邦」求予急援。因而總統夫人不僅向美廣播，大聲疾呼，並且不辭辛勞，親自去美，這也是配合着總統的萬里馳書，向美總統求援。

書柬的往還

迫在眉睫的變局關鍵，單就軍事看，當然就是卽將大規模展開的徐淮一戰，亦卽淮河兩岸帶着渦、潁、淝各小河流以及運河和洪澤湖邊的一戰，也就是國軍第一線兵團在長江淮河淝水之間與共軍最大最後一次的大決戰。當軸爲了應付可能影響整個戰局和政局的這一大變中的戰局，於自助無力之後，乃不惜馳書杜魯門求援，實逼處此，不得不然。這一書柬的往還可說是生死相關，不容作等閒看。這消息於一週前已約略透露於報端，但眞實的內容，一般人還不易猜出也不容易作判斷。

據紐約十一月十九日專電：蔣總統與杜魯門交換之函件，其內容如何，各方迄在揣測中，其後紐約時報，忽刊出其駐華特派員李博文十一月十八日之南京專電，意在對此一函件內容作首次之報導，李氏自稱，此項消息，係獲自中國人士方面。繼於美國新聞界，除紐約時報外，其他報紙與廣播電台，亦均廣事採用李氏來電，則美國人士對此訊之信任可知。繼李博文報導之後，蔣總統與杜魯門就中國內戰危機而交換之意見，今日此間亦有所透露。中國人士方面稱，蔣總統於其由駐美大使館轉遞杜魯門之函件中，曾要求如下：（一）美國發表一堅定聲明，保證於未來予中國以道義及物資之支援，藉以振作國軍士氣與民心；（二）對正在冀東歸綏太原尤其是徐海方面鏖戰中之國軍迅速增加物資之援助等等。據悉杜魯門之覆函，已於十一月十四日電達南京，在此覆函中，杜氏雖曾強調中美二國之關係及美國對中國局勢之關注，唯未在前所允許四億美元之軍事與經濟援華計劃之外，作任何諾言。不過，杜魯門曾通知中國政府，上述計劃範圍內之軍事供應品，正在加速運華中。據悉，此類軍用品，多係美陸軍部之庫存物資。據記者所得確息，最近南京海軍總部所部署之各型登陸艇和配置美式鋼砲之民船以及其他各種海陸軍用品無線電等等亦屬於上述計劃範圍內之供應品，前以限於運輸工具而未能運到者，今則大部運來，並非由馳書求援而得之軍火「美援」。

外電透露謂：中美兩國元首書柬往還之結果，予人以一種印象，卽美國國務院仍不欲肯定支持一個無自助力量之政府。美官方人士皆曾持有一項見解，卽懂靠美國之援助，依然不能解決中國之內戰問題，蔣總統必須依靠自身之努力，如軍隊紀律、行政效率及政治經濟徹底革新等是。由此看來，今日當軸求「美援」以應內局的急變，甚難樂觀。而美國官方人士中的期待於南京政府內部之革新程度當然和中國人民心目中的想像者更有甚大的距離。這距離並非僅在國民黨執政者自身的方面，同時實在於政府的基本國是國策須重新確定，始可有濟於事。然而這在當軸看，正等於自己讓自己的人來革自己的命，那是萬萬不容許的。爲斷定杜魯門覆函內容的可靠性，正可以廿三日華府的合衆電作補證。那電訊已略見於中國的報紙。大意是：雖然蔣總統已呼籲美國援華，但一般認爲美政府尙不致立卽採取任何對付中共進展的積極性措施。熟悉局勢的官員列舉下列因素：（一）美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必須由高級官員重加檢討。在檢討中，一切在亞洲具有戰略意義的友好政府的觀點，均將計及。（二）對中共由東北進攻華北的局勢，必須重加估定，以決定中國是否能藉大量的美國經濟及軍事援助而獲救。（三）美國在歐洲及中國的利益必須縝密權衡，以決定美國實際上能否擴展杜魯門主義至中國，而不致使「美援」因範圍太廣而失效。（四）必須與議會領袖會商，以確

知他們的對華觀點，以及在下年度議會中可能通過的任何擴大援助計劃。上列四點，與記者在本刊十三期的通訊裏指出蒲立德之使華，僅能呼之為「小救星」的意思，是大體相符合的。杜魯門這次的當選意外勝利，和他宣佈將繼承故羅斯福新政的傳統大有關係，而參眾兩院的議席和州長改選後的位置，除南方四州外，都是民主黨佔了壓倒共和黨死硬派的優勢，而且這些新議員和新州長恰巧又泰半是羅斯福新政派的舊雨，杜魯門說是進一步「援華」的事要等待八十一屆新國會開議時決定，顯然是與中國政府的求援，背道而馳。此外，馬歇爾的手法和設計也是對中國的政府不會有利。如果說中國元首為應急變以求「美援」，這封萬里書衆無異於郵誤或原緘遺失。美國的政府基本上雖然是代表少數資本集團的，但她畢竟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國，輿論之或左或右，只要是有力，杜魯門馬歇爾即必須顧及的。我們無妨把東北之戰以後的美英報紙的論調，摘要的列舉，以明政府渴望中的「美援」，是否緩不濟急和可望而不可即。

外報論美援

以下所引用的各報誌的資料與評論，中國人大半是不容易看到的。這般報誌，除一二自由派的報誌外，幾全是屬於右傾陣線的，而且一向都是對中國政府的「反共」予以相當的支持的，然而現在的論調都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大灣子。

首先是美國廣播公司記者福衛斯特七日自東京廣播稱：中國政府業經提議，如美國保證能保衛上海，則將宣佈上海為國際城市。渠謂中國政府業將此項提議交與美西太洋海軍司令白吉爾，聞已請白氏轉達華盛頓安。福氏並稱：駐中國美國海軍被留駐該處，以備萬一，一旦上海宣佈為國際城市時，得以保衛之。這消息雖似與「美援」的難求無關，但可以看出當局應變的「苦心孤詣」，和外人對中國戰局的悲觀心理。倫敦七日電傳超然派保守份子主辦的英國兩家最有力量的星期報，今日皆以首頁刊載關於中國局勢之論文。觀察報評論家葛琳為文稱：中共在中國東北之勝利，乃最具嚴重性之歷史事件。無人不信整個中國北部以迄於長江沿岸短期內皆將為共軍所有。因此在遠東之心臟地區，行將成立一擁有二萬萬人口以上之「共產主義國家」。葛琳認為國軍之失敗，乃中國政府之愚蠢與腐敗管理有以致之。渠並斥責稱：在戰事未開始前，東北即已為渴赴關外之國民黨投機政客所丟失；此輩官僚政客之錯誤統治與剝削，卒驅使東北人民投入共軍行列。同日，星期泰晤士報專欄作家史格魯特達亦為文批評中國政府之腐敗無能及其在對共軍作戰中之失策處，史氏為著名之「反蘇反共」政論家，其立論恐猶為對南京政府之善意的批評。該報又發表其駐北平特派員之來電稱：如美國繼續援助南京政府進行作戰，則美國人之在中國將為中國人所厭惡等語。最紐約八日電：明星報軍事分析家衛納今日稱：東北之失守，對於南京政府具有決定性之意義。彼認為蔣總統最近之損失已使中共軍力與國軍之比例變為三比一，而中共全部戰鬥力與國軍之對比可能為五比一。衛納前為紐約下午報軍事與政治評論家，渠認為國共力量之比例如此，國軍欲防與共軍進攻殊難成功，因若無軍隊，亦即無抵抗，其結論是：蔣總統已失去中國與美國。衛納復批評國軍依賴大城市與鐵道之戰略，可與當年日本佔領中國之情形相比。衛納復引用保守黨之倫敦經濟學者雜誌的言論，謂國民黨區域中的大學生與一切政治活動之青年學者，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均已同情中共。同日倫敦電：此間倫敦泰晤士報，今日再度於社論中評論中國之局勢稱，「中共今日之所以得勢，並非由於其本身有許多長處，而係由於其敵人之有甚多錯誤使然。」繼謂：中共佔領東北後，今已獲得擁有巨量經濟資源之基地。彼等進而更能向華北與華中方面的廣大據點進攻。該社論對現在時局轉變而搜尋歷史上之前例稱：中共據有東北，預示南方將再度被北方「征服」；若共軍打通華北與華中之後，而若又決心南進，則國民政府將益受強烈之壓迫，即令「美援」能大量增加，國軍亦難於守住主要防綫或長江。徐淮之戰揭幕後，當徐東血戰正酣，黃兵團發圍時，紐約兩家日報於十一日撰論：力主美國撤退其全部駐華人員，蓋因彼時傳聞共軍已自北方西方進逼京滬之故。每日新聞報認為中國政府勢力已極微弱，如再支援，似無意義。美國最近可能仍繼續以大量軍事物資援華，但美國人民與論是否支持政府此舉，殊堪懷疑。該報認為美國應放棄此種不能竟全功之政策，減少美國之損失，故不如及速撤離中國。同日，紐約明星報社論主筆勒納亦撰文討論中國之情形稱：雅爾達會議之議決案，使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但中國政府之失敗，並非因蘇聯插足中國之東北，乃因國民政府本身之反動份子不予人民的糧食、土地、生活之信心，勒納認為與中共作戰非美國之任務。美國設想自中共掌握中拯救封建式之中國政府，將為一極瘋狂之冒險，此舉可能犧牲百十億美金及軍火以及千百萬名技術人員；以此，勒納主張，應任中國自已進行其內戰。

此外，對於中國當局最近向美國之求援及對於南京方面一度盛大宣傳曾經大捷之徐州會戰，英美報紙的論調亦耐人尋味。倫敦泰晤士報於廿日著論稱：中國要求美國增加援助，實使杜魯門陷於窘境。該論謂：杜魯門恐能有若干理由，仍可將物資送與迄今猶未能適當運用過去曾經獲得援助之政府？何況繼續援助此等政府之措施，更將減少對西歐國家之援助！杜魯門必須詢問南京政府：是否具有政策使中國人民團結，具有建設性而替代共產主義，中國自由份子之見解如能於政府中具有作用，改組後之新政府可從事迫切需要之社會及經濟改革，美國當可減少若干困難，然以上均為業已消滅之希望。同日，紐約電，各報編輯部為「徐州大捷」為南京政府過分誇張之宣傳。前鋒論壇報認為「國軍徐州之捷」乃「片刻之喘息」，其他各報幾一致認為「當前杜魯門的問題為是否援華，抑從此根本置之不理，」和「如仍援華，則接受者為何人，然後美國再決定援助之數量及遲速緩急，美國是否能督接受者有效利用此種援助」等等。

「外報論外援」的實例，暫止於此，據悉此種論調的趨勢方興未艾，國人對此的感想如此，想無待記者贅言了。但由以上的論據與事實，中國局勢之須「變」，或其本身必然要變，那也是確切的事實。

不變也得變

當前的變局，急如星火，而應變之術於自助之力不絕如縷之餘，又被迫不得不仰求外援；但這外援的獲得又如是其渺茫，豈非真面臨一空前的險局也歟？這個「變」局要如何來應付，好像必須「搔首問青天。」要變麼，怎樣變法呢？改組行政院，拉出「巨頭」的孫科或智囊的張羣來，可以挽政治的狂瀾？「幣改」改而再改，可以挽經濟的狂瀾？再上兩電求軍火和金元，並且提前使用新兵團，進而決定固守京滬綫，吸引對方在淮河兩岸決戰，可以挽軍事上的狂瀾？記者還沒聽到有誰作上述主題的答案。歸根結柢，怕是當軸自身也須變，將國是國策作一番天翻地覆的大變，但這樣的一變，豈不是等於自已搬石頭打自已的腳，等於用自已的手掌握自已的腕？中國歷史上，封建時代的英雄領袖，絕少的肯這樣幹。然而非如此，不足以言「應變」。結果如何，那只有走着看。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社會經濟組織的內部，確是在蛻變，總難免新陳代謝地一場遞嬗的局面，記者在本刊九期通信的「政局報告」裏，曾客觀的作一觀察的判斷，指出「人心已在變」和「人民似已向變的方向看齊」自信那不僅是一種率直之言，而是根據那縱的時間和橫的空間所作的一種全面性整個性的判斷。自然，變的時速和變的程度以及變的方面角度各如何，那還要看具體的實際的運用術來作答案。因此，記者所謂「不變也得變」，正是滲透了上述的兩個方面，也就等於說：「我們要變，他們也要變，中國歷史之神也在說，我一定要變，你變得好，算你變，你不變，我們也得變，」一句話總結：求援以應變，那只是空想的一種變。自身死也不變，徒看着人家變，那是一種絕大的危險。因為局勢已發展到「不變也得變」的地步了。

十一月廿七日寄。

華北山雨欲來

季明

（觀察北平通信）共軍秋季攻勢隨着瀋陽的陷落而結束，冬季已開始，一般人不知道共軍次一目標是華北還是徐州。最近徐州大戰終告爆發，一陣子急雷驟雨，反到冲淡了全國對於華北的注意。就華北人本身而論，也不免「燕雀居巢，不知危之將至」，然而埋藏在地下的岩漿，遲早總是要爆發的。

南下，南下！

先撇開軍事不談，我們且看看富豪們的逃難相。他們似乎「預知」華北不免易手，從張垣、從承德、從保定、從唐山、一齊擁到平津，有錢的定下艙位，連沙發籐椅也不忘攜帶，更闊的坐上飛機，狗少爺，猫小姐，也搭伴飛升。一時機場擁擠，碼頭阻塞，瞧那個「亂」樣兒，眞該請政府來「戡亂」一番。然而其間也有一樁好處，正如某報所說的：「感謝這班富豪將屯糧一齊拋出，使我們吃到幾天便宜食糧」。當上海米漲到一千八百時，這兒還不到二百金元。可惜好景不常，忽然鬧什麼「游資北流」，一下子將平津物價又漲了回來。據說南北豪門大會京滬，祇一個回合，北方豪門看看招架不住，便偃旗息鼓，回頭就跑。於是，前北平市長何思源，馬上乘機飛平，對夫人說：「上海物價受不了，咱們還是呆在北平吧」！

本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富豪門趨吉避凶，到也難怪，但除開富豪外，機關法團也有同趣，例如平津各院校就是其中之一。

先是，東北易手後，共方屢次廣播，除軍事外，還談到「解放區」教育問題，如「清華教授孟慶基現任石家莊××廠廠長」啦，「名歷史教授吳晗平安到達解放區」啦等等，頗使華北教育界起了點波動，因此，謠言馬上來了，有的人說，共方已決定梅貽琦留長清華，有的人說，范文瀾將代替胡適，繪聲繪色，儼然逼眞。一班右派教授「見微知著」，認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就提出了所謂「遷校」問題。

談到「遷校」，亦非易事。一位老教授說：「廿七年遷校、輪船、火車、飛機、樣樣都有，今天却湊不齊一樣，怎麼遷呢」？當然，交通工具之缺乏，圖書儀器之耗損，均足以構成困難理由，但眞正關鍵還不在此。如果你到過清華，北大的「民主牆」，你就明白了，那上面連篇累牘的寫着「為什麼要遷校」？「遷到那裏去」？「南方就平安麼」？原來除開前進的教授外，還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是反對「南遷」的。因此，燕大當局首先宣佈：在任何政治情形下，絕不攷慮遷校。清華校務會議避此不談。北大於接奉部會「着即討論呈報」後，經過教授一番「激辯」，也於二十三日宣佈「決不遷校」了。

截止目前為止，眞正實行遷校的，還只有「唐工」一校，那是因為唐山近在前線之故。其餘院校大都不遷。萬一共方吃掉平津，這批院校，由政府看來，「偽」是「不偽」呢？

不設防的都市

據瀋陽逃出來的難民說：自本月三日瀋陽易手後，政府飛機就沒有停止過轟炸，共方工廠固有損失，老百姓死的更多。論起來政府既已撤退東北，瀋陽總夠得上「不設防」的都市了，但還不免轟炸，則所謂「不設防」云者，就能保障安全麼？

「北平不設防」原是張申府提出的。張先生以「呼籲和平」的菩薩心腸，非正式向當局建議。接着平市議長許惠東也表示附和。華北當局雖未表示態度，但目下尚未設防却是事實。其實北平也無「防」可「設」。要設，大概也得在距城三十里外。蓋近郊平曠，無險可守，萬一兵臨城下，也就不必「血刃」了。

不僅此也，北平為三朝建都之地，經過若干變亂，文物依然無恙，甚至以日寇之凶頑，尚未妄加破壞。今日一方「戡亂」，一方「解放」，縱然殺氣騰騰，終是同室操戈，按理是不應該遷怒文物的。而且，就戰略言，共軍也無進攻北平的必要。但這並不是說共軍將捨北平而不取，北平畢竟具有重大的政治性，共軍拿下後，小則召開「政協」，成立「人民政權」，大則建為國都，要求國際承認。惟取之之法，却不限於戰爭，（小接觸當然難免）下文談到軍事，我們可以順便提及。

因此，一般「老北平」似乎都「胸有成竹」。記者碰到一位前清遺老，他就說：「怕什麼？直奉戰、北伐戰、中日戰、都沒有嚇跑我，北平才是中國的巴黎哩」！（按：巴黎陷落三次，均未破壞）。然而，人們至少也還有幾種恐懼：老百姓怕「絕糧」，壯丁怕「抽兵」，學生怕「逮捕」，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還怕「挨炸」。但這些都無關緊要：怕絕糧可以事先貯存，怕抽兵可以「下鄉」逃避，怕逮捕可以到××區去，至於怕挨炸，不是有人正在掘防空壕麼？

華北「七」陣圖

傅作義是主張「總體戰」與「游擊制面」的，前者偏於政治，後者着重軍事。在今暑以前，的確收到相當功效。但東北易手後，情形就逐漸不同了。第一，潰兵入關，人心惶惶，經濟既不易穩定，軍民更不能合作。所謂總體戰，成為「剿總」的一句空口號。第二，敵軍增多，壓力加大，一旦離點遠去，容易為敵所乘，所謂游擊制面，也只好暫時放棄。然則傅氏的新戰略是什麼呢？根據事實表現，應該是：集中主力、堅守點線、伺機出擊、爭取主動。依照上述原則，傅氏才在華北擺下一幅「七陣圖」。

這幅七陣圖，西起保定，東迄灤平（古北口外），北達張垣，南由津沽右折直抵灤縣。自地形看，恰恰繪成一個「七」字。環繞「七」字周圍，大軍雲集，而以津唐一線為獨多。論傅氏兵力，總共約為三十萬（地方團隊在外），以之分駐東西約四百哩、南北約五百哩的鐵路地區，自感不敷。但上述軍隊，大多裝備優良，給養充裕，如能鼓勵士氣，不難背城借一。加以陸空運輸，均佔優勝，譬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傅氏所恃，或即在此。

迄至目前，防區大致決定，原則上李文部駐平，陳長捷駐津，楚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撤出城垣），石覺部防守承德（現已退駐古北口），黃其武，孫渡所轄不變，然後以林偉儔，劉玉章增援唐山，孫蘭峯游弋察綏，鄂友三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部署，並非一成不變，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呼應，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圖，卒能阻陸遜追兵，救先主於夔府。今日傅作義擺下七陣圖，是否能穩定華北，挽回頹勢，那就得「盡人事」以「聽天命」了。

山雨欲來

現在我們看共方的佈署。

自國軍四十萬人在東北「解甲」後，共方為了改編降軍，調整內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數，尚未可知。幸而勝，則華北如在囊中；不幸而敗，則華北一戰，尚可捲土重來。蓋共軍五虎將中，彭德懷善「發兵」，聶榮臻善「練兵」，劉伯誠善「調兵」，陳毅善「將兵」，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冀東風雲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信）東北形勢改變，林彪的部隊就陸續越過長城來到冀東。他的部隊移動得很方便，因爲共區公路從長城外可以直通到灤縣附近的榛子鎮。截至目前，報上說已經發現了他六個縱隊的番號。這一支被外國記者讚爲「常勝軍」的精銳人馬，來到冀東，就說明華北的所謂小康局面也已面臨嚴重的考驗了。

林彪的隊伍，和原在冀東的李運昌部遍佈北寧路的旁邊，但却一動不動，只住在那裏，等國軍猜他的啞謎。面對這一龐大的壓力，傅作義作了如下的準備：（一）灤河以東撤退，首先炸毀石門朱各莊間的七十一號十孔鋼橋，然後分別拆毀兩邊的鐵路，石門至山海關一段，拆運到秦皇島，朱各莊至灤縣一段拆往唐山，軍隊集中秦皇島，和唐山、古冶、灤河大橋。同時由剿總自行派人運一噸炸藥到灤河大橋上，到必要時也炸毀它，好據守灤河。（二）集中防守兩點。把北寧路自北平至灤縣間的全部兵力（共十四個軍的番號，有二十萬人左右）集中在鐵路線上使用，特別以重點擺於塘沽和唐山兩大據點。因此鐵路兩側的小據點完全棄掉。（三）趕修天津塘沽間的公路，改善其路面和橋樑，同時增築自新河直通塘沽新港的新支綫，並計劃從新港到唐山另築一條新的平行綫。

兩軍陣綫擺開，攻守之勢顯然。按內戰的經驗，共軍未來的行動不外「圍」「攻」兩途，如取前者，便要截斷北寧路的全綫，把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四個據點完全孤立起來，像長春瀋陽一樣的長期圍困起來，這樣的作法，可能避免過多的傷亡與破壞，但却需要甚長的時間。如若採取攻的方式，則可一舉底定黃河以北，但却需要更多的兵力與準備較大的代價。

雖然平津有不少人杞憂着長春的地獄生活會在平津重演，但有資格的觀察家認爲這種可能性甚小。在共軍，東北華北實際已聯成一氣，必要時林彪的大軍可以整個傾注到北寧綫兩側。而在他們的背後，則是廣大的東北和華北共區，補給供應毫無困難。最近從共區來的商人都說，共軍中流傳着一句口號：「到北平過年吃包餃子」，這或者可以說明共軍對於這一個戰役很有把握，等準備完成，一聲動作，三兩個月內就想解決。

傅作義在軍閥時代守過涿州，抗日時代守過綏西，但這一次守這一條狹長的幾百里戰綫，意味已經完全不同。蔣總統把華北軍政大權一齊交給他，北方的許多大地主、土豪們、一切既得利益階級，在驚慌失措之餘，也把最後的希望一齊放在他的身上，無怪乎他要如此謹慎穩重，這實在不是平常的託付。他說，他「不能創造奇蹟」，但心裏却未嘗不希望有奇蹟會出現。

按這兩天的跡象觀察，前幾天外記者所鼓吹的唐山外圍大戰，迄未爆發，由於兵力過份向東移動，國軍在平津之間的防守大爲空虛，因此不得不將察綏軍向這邊增防。有名的暫三軍安春山部已調到通縣一帶，而整個察綏軍仍有繼續東調的趨勢。

包頭易手，歸綏孤懸，塞外空餘張家口一個活眼。傅作義旣已受命保衞平、津、唐，遲早恐怕不能不忍痛放棄他自己的那一塊發祥之地。察綏貪糧一向不准外運，凡用布疋往換的，都要繳四成的捐獻，前天忽由傅下令開禁，並鼓勵平津糧商儲量迅速前往搶運，另外華北剿總在張家口的軍眷陸續運到天津，三天以來已運到三四千人。現仍在繼續疏運中。軍眷搬帶着箱籠、舖蓋、床板、火爐、舉家遷徙，顯然是作久居的打算。看來察綏的撤退，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除開太原、大同、歸綏、秦皇島，這幾個飄忽的小孤城以外，北方的重心已集中在北平到唐山這一條鐵路綫上，幾十萬軍隊，幾百萬居民，一旦戰事爆發，食糧、彈藥、兵源都是嚴重的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人心。外僑撤退，外商銀行停業，大小官眷屬南遷，東北的敗兵到處驅擾，徵兵抓人，民心惶惶，大家談夠了「走不走」，現在每天只聽聽陝北的廣播，打聽瀋陽濟南來人談「解放」以後的政策，等候求來的日子了。金圓券害苦了人，也把有錢沒錢的人擠得走到一起，工商企業家，大學教授，和窮人們一樣的對現狀完全失望，這政府的官吏也不敢再打官話騙人。

軍事家預測戰事將自天津週圍開始，而共軍可能先不攻取天津，當鐵路中斷的時候，唐山和北平都不易久守。天津有一個塘沽港口，可能得到援濟，也可以最後撤退。如果保住塘沽，天津是可以守的。不過，大沽口一兩個月內就要封凍了。

形勢變得這樣快，以致每個人都可以大膽的預言，除非奇蹟出現，北方的大勢在過舊曆年前後將最後決定。

，倚兼四家之長。彼於抵定東北後，本可長驅入關，但爲萬全計，仍採滲透戰略。此種滲透路線有三：一爲山海關，一爲界嶺口，一爲喜峯口，均在長城沿線。

據一週來電訊，林部入關者，巳有第一、二、三、七、八、九、十一等縱隊，還有臨時改換番號的卅一、卅二大隊（約等於縱隊），及軍分區警備團等，加上冀東原有李運昌部，總數約達十萬人。目前重兵所在，係豐潤、三河、寶坻三角地帶。雖然平津各報日有戰訊，「剿總」且公佈「冀東進展順利」，但實際戰況，仍在密雲不雨之中。此間權威家分析，認爲林彪遲不求戰的原因，至少有三點：第一、林部初次入關，對於關內地形，尚未完全熟悉，故日來從容調動，俾士兵洞悉地形，且與當地人民取得聯繫。第二、林部不乏美式裝備，重武器如戰車等亦多，故連日趕修公路，以利戰時運輸。第三、冀東一戰，關係華北命運，林彪爲愼重計，必須與聶、姚、賀等密切聯絡，俾戰事發動後，南北西三面牽制，使傅部首尾不能相應。據此種種，則知冀東大戰序幕，一時尚難揭開；惟揭開之後，卽非短期所能結束。蓋共軍目的集中津沽，津沽一失，則唐山開灤，北平孤立，整個「七陣圖」，就不攻自破了。華北當局有鑒及此，連日大軍東調，雲集唐山一地者，卽達六七萬人。同時，爲預防共軍切斷平津線，並增強津唐軍運起見，一面增兵楊村廊坊，一面計劃於津唐段鋪設雙軌，佈署不可謂非萬全，但用兵之妙，存乎一心。今後共軍抑係先取唐山，抑係直趨津沽，甚或聯合聶部，切斷平津，則須待山雨旣來之後，才知分曉。

傅作義往何處去

萬一華北大戰失利，傅作義往何處去呢？目前雖然是一個謎，但已有許多好事者紛紛估計了。

無庸諱言，傅氏今日在國民黨的地位，眞可謂「一人之下」了。一個起家察綏，出身偏僻的武夫，仗着潔身苦幹，榮獲大命，其所受「知遇之恩」，洵非等閒。況蔣總統已表示授傅全權：「中央命令與傅司令有抵觸者，前者無效」，此種絕對信賴，似較「上方寶劍」尤過之。傅如「知恩」，則縱粉身碎骨，作爲「孤臣孽子」，亦何敢辭？可惜二十世紀已非封建時代，傅氏本人卽欲臨危不屈，其若下僚屬亦未必翕然影從，因此，萬一失敗，就不得不考慮到出路問題了。

我們先假定傅氏決不投降，亦決不會被俘，則失敗之後，是退往察綏呢？是撤回華中呢？還是有第三條路？就目前情形看，傅氏似乎還未決定，而且也無暇慮此。擺在傅氏面前的，只是如何充實兵力，如何向外擴張。華北七省市參議會已經向中央建議：請將原有東北軍隊及經費，撥交華北，估計此項軍資，能裝備關內一百個師。傅氏本人則與賴普漢直接洽商美援，並且說，「華北有一分美援，便有一分力量」，「與其說是危機，不如說是生機」。

有人推測傅氏失敗後，可能撤向察綏，與寧夏二馬攜手，演成本來「割據」的局面。就傅氏個人說，這當然是「固所願也」。但共軍假令企圖統一中國，則此着「後手棋」，當然在預防之中。最近察綏無戰訊，但雙方均在伺隙而動。如果賀龍姚喆部不參與華北會戰，則此一着閒棋，正是傅氏北撤的尅星。因此又有人推測傅氏可能由靜海南下，退保冀中、與王鳳崗打成一片。此種可能性更小。冀西北有聶榮臻、東南有陳毅，內外夾擊，根本立脚不住。於是，最後還是「南撤華中」較屬可能。觀乎傅氏最近放棄承德，撤守保定，加強秦皇島與津沽段軍事等措施，大有「進可以攻，退可以走」的企圖。而且，就共軍方面說，亦無全部殲滅傅部的計劃。萬一敵人敗走，正好「窮兵勿追」，一心整頓華北。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游於海」，傅氏其有意乎？

（十一月廿四日）

幣

邵燕祥

這是一首沒有流傳的歌謠：

說大話，使小錢兒，
拿着大張爛紙，說是金圓兒，
不折不扣地
不值錢兒！

這是北平西城牙鐵胡同三號住的乾老婆，唱給她的外孫驟子以及其他的小孩們聽的。幸好隔壁四號住的巡警胡老二，善意地規勸了乾老婆，否則這首歌謠早已流傳開了也說不定。那天胡老二瞧上乾老婆正招來一圈頑童坐在門檻上唱歌數落，他就走過來搭訕道：「老太太，您吃啦？……」

他聲音像嚷。因爲他知道乾老婆上了歲數，有些耳背。

「偏了，你也下班了，胡老二？」

「對。這兩天可緊，暢開地擺忙，鬧檢查，也不得閑兒。您這套歌兒可也別唱了，外頭正拿人哪。」

「那是怎麼會說的？我編給孩兒們聽的，都是大實話呀。」

「您不明白？官家聽不入耳呀，就是。咱們街里街坊，倒沒甚麼的，怕要是傳出去……」

「天月二德！天月二德，我這把老骨頭，……」

「您可還不知道外頭的模樣哪，簡直是發瘋子，鬧得慌！局子有個王兄弟，說句金圓券不值錢，就挨了警長這一頓刺溜，還是且央告，這纔警誡一次，算是。……」

「這算安下什麼心啦？滿嘴上天官賜福，一肚裏男盜女娼。應了那句話了，說大話，使小錢，眞箇的嗎。合着還不許人說，是不？」

「說是誰，再抱怨，可就算共產黨啊，說共產黨纔說金圓券不值錢哪。那還不就值得槍斃？」

乾老婆一個人叨唸：「哦我像不像共產黨啊？……我倒不是說金圓券兒不值錢，我是說它到我手裏就買不出什麼東西來啦。胡老二，是不？……雜宗——」

於是她和野孩子們，便換了一個題目。

「再說個吧，再說個吧。」一陣要求的吵嚷。

「別『說』了，兩頭不願意，再等好姑娘吧。」

乾老婆肚子裏，事由是眞多的，誰也不知道她有多大歲數。假如在一串串古錢上，數得出個個的生命，則艱難苦恨繁霜鬢，同樣，從衰老的乾老婆身上，可以講半部貨幣史。她記載着花紅銀、銀錠、銅板、角子、鈔票……怎樣在她的多蘿手掌上，寫下了流水賬。

但在所謂「古時候」，人們還有化銅板和小鈔的幸運時，老倔的乾老婆，已就在翹着嘴詛咒，帶着思古的幽情：

「聽聽，什麼詞兒，一大枚，一小枚，枚枚枚，早晚都沒了！分分分……」後來她又照着解釋幣值爲什麼發一毛一。知道她性情的，就都笑着說：「一咒十年旺呵，歇歇嘴兒吧。」

於是乾老婆就又唱「香香屁」，哄孩子去了。

不然爲什麼說乾老婆，事由多呢，實在她太講究媽媽例了。譬如早起不准說夢，晾褲子的竹竿下，不准通行，還有吃飯時不准敲碗，怕是窮神餓鬼聞聲而來，但這往往招致抗議：「咱們不是比窮神餓鬼還窮上三分？……」還有譬如不准驟子在吃飯時唱歌謠，怕隨飯吃下忘却。

這倒感謝乾老婆，果然從驟子口裏保存了一些她的作品

勝利後，報紙多，一然黑，報童們在大街上就拔腿進電車跑，——是的，不要忘記，乾老婆是把電車叫作Diang-Diang兒車的。——一邊口裏大聲喊：

××晚報，平津晚報，晚報咧……

乾老婆就油然數一口氣，積勝地道：「平津晚——報，平津晚——報，在劫的難逃，遭難遭的晚就是了。」

但沒人相信，連她也只隨便說說，跟着尾忘掉。不料勝利一天天變得「好不慘然」，乾老婆唱起來：——

盼××，
望××，
××來了更遭殃呵。
（雜和麵一天張三張呵。）

孩子們給陀螺命名「漢好」，乾老婆又在感慨起來了：

抽漢奸、
打漢奸，
看看老陽兒看看青天！
氣往平處吐，
水往平處淌，
對不起百姓，就是漢奸！
沒見過漢奸審漢奸！

人家唸報給她聽，一邊是吵嚷平抑物價，一邊是物價一股勁張，她就嚷嚷：「我見過的世面多啦，……」

牛×爛，狗×嚇，
這樣的死×衙門，
怎麼不完蛋！

美軍駐紮在北平，乾老婆早就瞅不入眼了，她說：

大老美，
二老美，
切下半截兒，就
活脫是日本鬼！

生活難，感慨多，唱不盡，唱過也就忘到脖子後了。但物價跳，大鈔飛，肚子塡不滿，乾老婆又在重複着「晚報」論。

打聽打聽乾老婆的經歷兒，也打聽不出什麼來。只知道她曾在一個老實的讀書人家作女傭，直到很老。女兒改嫁了三次，最後嫁到牙醫胡同，就接媽來吃這碗不舒心的飯。

有一回，她狠狠地詛咒官家。——民國二十四五年，官家鬧着把洋錢換法幣，說什麼過了期就沒收的那一套老話。不是說麼？乾老婆以前的老主人家是老實的讀書人，就都把銀元打折扣換出紙幣來了，乾老婆有一二百現洋，也就學樣一股腦換成爛紙，作爲一點體己的積蓄，壓箱底。

——唉，一乾老婆親口說這話的時候，正是市面一袁大頭一走紅的時候，她愁傷地嚷道：——這官家，坑、騙、雜宗——」

那時候，很老的乾老婆是不大出門了，她已快老糊塗，耳聽眼花，也認不得豆腐干樣的新紅綠綠法幣紙。她一個人出去，誰敢放心？

忽然，却哄鬧開了，改金圓券，收金收銀，並且提人——

當乾老婆聽說「百萬只換一塊的時候，許久說不出話，總怪怕地道：「呵，三百萬，那是多少哇，換一張紙？」

「哇，當然是紙嘍。金子只望裏收。」

「媽的×，又是那一套。兒老百姓，搶老百姓，老姨不就光了嘛。紙裏沒藏金，據匯股也不夠，頂啥用？三百萬，他媽的三百萬！太狠了，太狠了！」

「——可是啥東西也不漲價兒了！」

「——眞的麼？……」乾老婆有點糊塗，有點訝然。

馬上偌大的北京城顛倒起來了。雜合麵也買不到。由乾老婆領驟子看家。驟子的媽成天去擠油鹽醬醋，清早出去，晚上回來。

巡警胡老二可像發了財，麵口袋等等永遠飽飽的。滿臉笑嘻嘻。

「——您吃啦？」

「——沒有哪。你下班啦。」

「——嗯嗯。」

乾老婆坐在門坎上：

「說大話，使小錢兒，
拿張紙，說是金圓兒，
這樣的官家，溜了崖兒！
這樣的弦子，折了弦兒！

她淒然地唱了起來，乾啞低沉而憂鬱。……

她餓着哪。

那是誰說的呢？——「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爲冷嘲」

（一九四八，十一月二日北平。）

來函照登

逕啓者：貴社觀察第五卷第十期讀者投書欄「台灣與米」一文內有：「日前澎湖縣老百姓因食米到糧食分所去交涉，要求購米，旋被該所拒絕，因而發生搶購現象，政府派了軍隊鎮壓，並擊斃了幾個老百姓……」等語，核與事實不符。澎湖雖孤處海中，一切主要物品多仰台灣供給，但其產物之外銷，已可解除入超之患。近日此地颱風連月，對外交通幾乎斷絕，但糧食問題並不因此發生恐慌，而有搶購糧食情形。特此函請更正爲荷。此致觀察社

台灣省澎湖縣警察局局長谷冠軍啓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二號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S)北四川路一九七一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4

訂閱價目
一次先收金圓三十元，照售價七五折記賬，款盡通知續訂

觀察航空版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二元）
（台灣版每冊售台幣1000元）
分銷處：[illegible]書報社